

毛澤東留下 農村農民問題豐厚遺產



1939年，毛澤東和延安楊家嶺農民親切交談。

從建黨到改革開放前的50多年間，我們黨對農村農民問題的思考 and 處理，與毛澤東緊緊聯繫在一起。黨領導人民取得了包括解決農村農民問題的巨大成就，也發生了嚴重曲折。這構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努力解決好“三農”問題的基本。如何對待這份遺產，是正確對待黨的歷史、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理論遺產。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拓者，是我們黨最早正確認識農村農民問題的主要代表。從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這一最大國情出發，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必須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建黨建軍的首位，以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各種局限性以及錯誤思想對革命隊伍的不良影響。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澤東把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為重要一翼，走工農業並舉的工業化道路，都體現了他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解決中國問題的前後連貫性、一致性。

毛澤東對農村農民的正確認識和解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毛澤東善於對農村農民問題深入思考和調查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不是天然或自動發生，只有通過中國共產黨人主動自覺地運用調查研究等方式方法才能實現。回顧毛澤東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調查研究始終伴隨其中。毛澤東一生寫了大量的調查報告，而關於農村農民的占了極大部分。收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1926年至1941年9月的文章就有17篇之多。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提出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等重要論述，大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進程。

革命遺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主要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着眼解決農村農民問題，貫穿這兩場革命始終。第一場革命反封建封土制度，這場革命至1952年底完成。第二場革命中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實現農業

集體化。土地改革任務完成後，黨“趁熱打鐵”，到1956年底，就基本實現以土地為中心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其後經過曲折探索，至1962年形成了“三級所有、隊（小隊）為基礎”的相對穩定體制。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很小的國家，由土地等生產資料私有造成的土地兼併，以及資源、財富集中於少數人而帶來的兩極分化，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必須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建黨建軍的首位，以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各種局限性以及錯誤思想對革命隊伍的不良影響。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澤東把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作為重要一翼，走工農業並舉的工業化道路，都體現了他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解決中國問題的前後連貫性、一致性。

毛澤東對農村農民的正確認識和解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毛澤東善於對農村農民問題深入思考和調查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不是天然或自動發生，只有通過中國共產黨人主動自覺地運用調查研究等方式方法才能實現。回顧毛澤東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調查研究始終伴隨其中。毛澤東一生寫了大量的調查報告，而關於農村農民的占了極大部分。收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1926年至1941年9月的文章就有17篇之多。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提出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等重要論述，大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進程。

革命遺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主要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着眼解決農村農民問題，貫穿這兩場革命始終。第一場革命反封建封土制度，這場革命至1952年底完成。第二場革命中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實現農業

用於重工業建設。這在當時算是天文數字的資金投入，主要依靠廣大農村及數量巨大的農民。

同時，毛澤東認識到，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這樣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而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他甚至這樣強調：“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這一思想後來形成農、輕、重為序的戰略思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傳統農業開始了向現代農業轉變的歷程。農業機械化迅速推進，化肥及農用電力快速增長，全國土地灌溉面積大幅增加，為後來鄉鎮企業崛起初步奠基的社隊企業不斷發展，特重大水利工程不斷上馬，大江大河的治理及一般洪水災害得以初步控制，以及我國糧棉等農作物產量大規模提高等等，都是黨和人民推進我國農業現代化取得的重要成果。

防止兩極分化遺產。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毛澤東在土地改革完成後，即趁熱打鐵實現農業集體化，在遇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重大挫折後不斷調整，在1962年使分配規模退回到1956年初級合作社按小隊經營和分配（即“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核算單位是小隊不是大隊）的水平。他堅決不同意退到一家一戶生產經營的包產到戶，其根本考慮，就是擔心出現兩極分化。這也成為毛澤東當時的政治底線。他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一方面是貪污多占、放高利貸、買地、討小老婆，其中包括共產黨員、共產黨的支部書記；另一方面是破產，其中有四屬（軍、工、烈、干屬）戶、五保戶。鑑於歷史局限，他把包產到戶還是農業集體化，看作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分水嶺，對多數中央領導同志支持或允許包產到戶，他多次從兩個階級、

兩條路線鬥爭的角度進行嚴厲批評。毛澤東以特殊方式提出的防止兩極分化重大課題，我們至今仍在回答和解決的路上。

精神遺產。包括我國農民在內的中國人民歷來具有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鬥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但近代以來，中國反動統治者腐朽無能和喪權辱國，使中華民族這一偉大精神長期受到壓抑而得不到張揚發奮。但當農民被黨及領導的農會組織起來後，就呈現出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熱情謳歌了農民運動展現的革命精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這是黨的“敢於鬥爭，不怕犧牲”精神在組織起來的農民身上的初步表現，中國農民在精神上開始從被動轉向主動。在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這種完全不同于過去舊式農民鬥爭的新式農民運動高潮迭起，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最終贏得了我們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其間構建了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如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呂梁精神）、沂蒙精神、大別山精神、老區精神等，不僅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面貌，也反映了作為這場革命的客體力量——中國農民新的精神面貌，落後的農村成為推進中華民族偉大事業的先進基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這些精神不斷得到新的弘揚。在新中國的廣大城鎮和鄉村，一掃社會的污泥濁水，黨與人民魚水情深，人與人相互關心、相互幫助，風氣淳樸，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至今仍被人們所懷念和津津樂道。所有這些都化為推動新中國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

牢固的執政基礎遺產。中國共產黨執政，經歷了由建立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的過程。黨和毛澤東以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贏得了包括中國農民在內的廣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擁護。農村和農民成為黨執政的堅強后盾和牢固基礎。在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我們把“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擴展到全國各個地方，使黨的領導直達基層。

毛澤東時代雖然成為歷史，他的豐功偉績及創立的科學理論，打下了黨長期執政堅不可摧的根基。毛澤東創立的科學理論——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執政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思想和精神的“元要素”，已經深深融入我們民族文化的血脈之中。我們黨後來創立的理論成果都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毛澤東以各種不同方式提出包括農村農民等許多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以及預言箴言，永遠需要我們後人以高度的智慧深入思考、高超的能力加以解決。

（據《學習時報》）

溯源

“名宿”不能指稱現役運動員

有些體育解說員或體育記者常犯的一個錯誤是：以為在某俱樂部效力過就可稱“名宿”。所以經常出現現役運動員被稱“名宿”的可笑場景，比如“巴薩名宿梅西”這類稱謂。這種誤用的原因在於不懂得“宿”字的本義。

“宿”的甲骨文字形像一個人睡在室內的席子上。《說文解字》云：“宿，止也。”意思是夜晚在家裏休息臥止。因此“宿”的本義就是住宿、過夜。

《詩經·周頌·有客》是周天子宴客之歌，其中有“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的詩句，住一夜稱“宿”，住兩夜稱“信”，那麼“有客宿宿”則是住兩夜，“有客信信”則是住四夜。

由此可知，必須隔夜才能稱“宿”，比如“宿醉”指昨夜喝醉，隔了一夜，到今天酒還未醒，又比如“宿雨”指從昨夜一直下到今天的雨。“宿”從而引申為隔年的、前一年的，又引申為積久的、前世的，等等。

因此，就體育界而言，“名宿”一定是指退役的著名運動員，猶如說從前是現役、如今已經過了現役的運動員。體育界之外，“宿”的引申義可用來形容長久從事某項工作的人，比如“宿將”指久經戰陣的將領，“宿儒”指長期钻研儒家經典的人。

有人反駁說“名宿”之“宿”指星星，那麼“名宿”就可以理解為體育明星。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首先，“宿”是星座之名，比如“星宿”“二十八宿”，不能單獨用來指一顆星星。其次，“宿”當作星座之名，實際上仍然是從其本義而來，東漢學者劉熙在《釋名·釋天》中解釋說：“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最後，古代、現代漢語中都沒有“名星”一詞，某個領域內有影響力、有名的人物只能稱“明星”。

（據《天津日報》）

“政府”本意指房子

政府是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指的是國家行政機關。但“政府”一詞的本意並非如此。

在唐朝，封建社會各種體制已經成熟，國家政權機構發展確立了負責中樞政務的“三省六部制”。三省是：負責決策的中書省，負責審議的門下省，具體執行的尚書省。三省長官共同行使宰相職權，負責處理國家政務。這些長官日常辦公的地方叫“政事堂”，號稱“政府”。“府”是官署的通稱，亦即百官會集之處。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說：“李林甫領禮部尚書，日在政府。”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云“政府”即政事堂。這大概是“政府”一詞的最早出處。

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政府”一詞早已演變成為國家行政機關的代名詞了。

（據《天津日報》）

拾遺

郭沫若痴迷甲骨文

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住在東京附近的千叶縣。一天，在逛書店時，他發現了《殷墟書契考釋》一書，如獲至寶。很快將東京書店和東京圖書館中所有甲骨文字以及金文的書籍，全部都翻閱了一遍。

接下來，郭沫若又訪遍了日本所有的甲骨收藏者，把看到的甲骨藏品都拓印下來，掌握了大量的實物資料。那一期時，讀甲骨文、抄甲骨文、鑽研甲骨文，成為郭沫若每天雷打不動的功課。每天吃飯的時候，他也会把書片一塊塊地擺在飯桌上，讓全家人辨認，那是一家人最快樂的時候。

1930年1月，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由上海聯合書店出版。這部包括“甲骨文”在內的著述，把甲骨文研究與古代社會的研究結合起來，一經面世，即大獲好評。接著，他又相繼出版了《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圖考釋》《金文考索》《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等一系列甲骨文專著。其中，《卜辭通纂》將“卜辭之精粹者”分8類編排并作考釋，開出了甲骨文研究的新體系，“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郭沫若興奮之餘，作詩一首：“中原文化殷始創，觀此勝於讀古書。一片甲骨驚世界，最隸一邑震寰宇”。

郭沫若晚年又組織編撰了13冊《甲骨文全集》，收入41956片甲骨，不僅對數千片甲骨文進行逐條釋文考釋，而且對斷片綴合、殘辭互補、卜法文例、分期斷代諸方面都有獨到的創見。唐蘭評價甲骨文研究時說：“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雪堂是羅振玉，觀堂是王國維，彥堂是董作賓，鼎堂是郭沫若，這就是鼎鼎有名的“甲骨四堂”。

（據《人民政協報》）

梅貽琦心中的平等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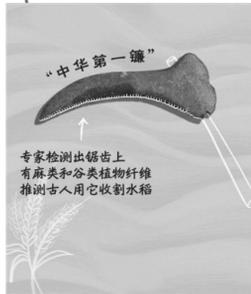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是一位待人隨和的謙遜君子，雖然他名氣很大、職位很高，但一點都不拿架子，與他相處的人都會有如坐春風的感覺。

梅貽琦校長主政清華多年，可謂桃李滿天下，在眾多的清華校友中，既有名聲顯要者，也有年級晚、地位低者，但梅貽琦先生對待他們一視同仁：無論地位高還是地位低者來找他，他都同樣熱情接待；校友們請他去餐敘，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普通校友，他都欣然前往。

蔡麟筆是1947級的清華校友，見梅校長對待校友不分貴賤一律平等相待，心中很是感慨，便問梅校長：“何以對畢業同學不計名位一律看待呢？”梅校長回答說：“師生的感情是很自然的，是有因緣的，各個人的際遇不同，環境有異，年紀低，年齡小，當然不會像高年級的同学一樣。所謂富貴權勢全是世俗所崇尚的身外之物，師生就是師生，如果以位高權貴來衡量，那還能算師生嗎？那是商賈的行為。”梅貽琦的這一番話，令蔡麟筆十分感動，他回憶說：“當時在座的有劉崇鑑、查良鏞、包國華多位，听罷全默然久之。”

（據《聯誼報》）

從“铲铲盘盘”中看 8000年前的丰收图景



【中华第一镰】

【谷物脱壳机】

裴李岗，河南新郑市西北部一个普通的村庄，看似平平无奇，地下却蕴藏着近万年前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奥秘，将我国的农业史提前至8000年前。

通体磨光，弓背内曲，背面略厚，向下渐薄，这件锯齿石镰距今8000年左右，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锯齿石镰，被称为“中华第一镰”（如图1），出土于裴李岗遗址。

石磨盘是用一大块砂岩琢磨加工而成。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磨盘盘底四条对称的柱形短足，是在厚石板上细细琢磨出来的，加工难度极高。石磨盘配合石磨棒使用，堪称中国最早的“谷物脱壳机”（如图2）。

这是一件陶罐，也是一件“酒壶”（如图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永强介绍，8000年前的裴李岗人已经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

猪具有生长快、成熟早、繁殖能力强等特性。对已从事定居农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最适宜饲养的家畜。这只萌萌的猪头，裴李岗遗址目前仅此一件（如图4）。杜平安介绍，这表明当时猪已被驯化饲养，并被作为艺术品加以表现。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宝贝”远不止这些，走进新郑市博物馆，一件件石铲、



“酒壶”（图3）。



萌萌的猪头，裴李岗遗址目前仅此一件（图4）。

石斧、锯齿石镰、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保存完好，陶罐、陶壶、陶勺等炊饮工具种类齐全，见证着先民们当时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

如今，一幅8000年前热闹的农耕图景，正依托丰富的考古材料被不断还原——先民们用石铲翻土松地，丰收之时

（据新华社）